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下）

孙玉杰

摘要：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先后出版两个版本，多次印刷，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2001年的修订版是1998年初版基础上，参考高华、杨奎松和齐锡生三位教授的书评进行的修订版，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就五大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期待促进中共党史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陈永发；书评

作者：孙玉杰，淮北理工学院教师、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邮箱：sdj602@126.com

Title: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Two)

Abstract: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uthored by Researcher Chen Yongfa, is a classic work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wo versions 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printings,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vised edition from 2001 builds on the original 1998 version,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book reviews by Professors Gao Hua, Yang Kuisong, and Qi Xisheng. However, it still presents several issues.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five major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m with Researcher Chen, with the hope of advancing the study of CCP history.

Keywords: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Chen Yongfa; review

Author: Sun Yujie, a lecturer a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Chen Duxiu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rea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mail: sdj602@126.com.

(三) 史实问题

历史学的最大价值是追求真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给人类启发，同时，求真、求实也是史学著作的最高目标之一，“史实”错误是历史著作的最大“硬伤”。陈著 1998 年初版中的“硬伤”，在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已经指出，在 2001 年修订版，陈著作进一步修改，但是，2001 年修订版中，仍然存在诸多“硬伤”，此乃史家之大忌，在修订版着实不应该再出现。

1. 第 2 页，“1989 年苏联解体以后”；第 5 页，“到了 1980 年代底，苏联分崩离析，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也相继风云变色”；第 956 页，“1991 年 8 月，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也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属于“硬伤”。因为苏联是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的，“苏联于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1991 年 12 月 25 日停止存在”¹，“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政治改革的影响下，先于苏联解体前，相继发生剧变³，已经是基本的历史常识知识。

2. 第 10 页，“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他是带着历史包袱来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不可否认，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和在肇始阶段的作用，但是，讲“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太符合历史的史实，忽视了华国锋在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历史功劳，“中南互访对后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⁴，“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

1 (俄) 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798 页。

2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年，第 465 页。

3 (英) 本·福凯斯著、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1998 年，第 249-282 页。

4 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

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起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⁵。陈著的此论断中，如果不带“开始”两个字，则不存在历史史实的质疑。

3. 第 18 页，“毛泽东认为提倡四大自由，是提倡‘大民主’，并讽刺西方议会式民主是‘小民主’”。在毛泽东心目中“大民主”与“小民主”概念有个时空转换问题，不能笼统说此观点。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就反对“大民主”，为此还把提倡“大民主”概念的李慎之，划为右派分子，形成一段公案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提倡四大自由，认为是“大民主”⁷。

4. 第 26 页，“1957 年大鸣大放，便有民主人士批评中共是小知识分子党。毛泽东听后勃然大怒，但承认中共是小知识分子的党，要求党员以事实证明小知识分子也会治国”。这里提到的民主人士是罗隆基，罗批评中共是“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⁸，而不是批评中共是“小知识分子党”，更无毛泽东承认中共是小知识分子的党的说法。

5. 第 35 页，“他（指毛泽东）在 1940 年代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⁹，在 1007 页，陈著也表达为“1938 年底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前后叙述也发生矛盾。

6. 第 52 页，“到八年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疲惫至极”。陈著“八年抗战”说，其实，关于抗战的起止时间，多有争论，陈著

春秋》，2008 年第 8 期，第 8-10 页。

5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炎黄春秋》，2011 年第 3 期，第 9-17 页。

6 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 年第 5 期，第 46-51 页。

7 萧克、李锐、龚育之：《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国翻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14 页；李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兴起、入宪与废除》，《兰州学刊》，2006 年第 12 期，第 45-48 转 128 页。

8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7 页。

9 许兴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26 页；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37 页。

中，也应该表达出来。1978年，辽宁地区文史专家，就已经提到“十四年抗战”的主张¹⁰，学术界公开表达“十四年抗战”的文章和著作，也出现较早，1988年，就已经公开出版带有“十四年抗战”的著作《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史论文集》中，有多篇论文标题出现“十四年抗战”字样¹¹；王秀英于1999年，发表《论十四年抗战》，“本文的观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九三’光复，整整14个春秋”¹²。

7. 第69页，“从1917年11月到1919年5月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的时间是1919年3月2日-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¹³，“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两天后改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正式成立”¹⁴。

8. 第87页，正文和注释23补充内容中引用黎永泰的《毛泽东与大革命》著作中都提到毛泽东读过的一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应该是《共产党宣言》，在黎书中也是《共产党宣言》¹⁵，在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一本书，在陈著却写成为《共产主义宣言》明显是错误的。

9. 第106页，图片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时，说“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查《周恩来年谱》未见留学英国的记载¹⁶，而且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其实未去过英国”¹⁷，应该在2001年

10 陈凤军：《“十四年抗战”1978年由辽宁专家提出》，《人民网》，2017年01月17日，查阅2023年05月27日（此文章，在这里仅仅提供一个信息，陈著作作时，不可能知道此种情况）。

11 潘喜廷主编：《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史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12 王秀英：《论十四年抗战》，《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20-23页。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6-76页。

14 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5 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6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25-29页。

17 《杨书评》，第176-177页。

修订版中，修订过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0. 第 228 页注释 1 中，问题是一，该注释没有史料来源；二，向忠发的职务表述不正确，“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会兼中央主席”，第 231 页的表述也不一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主席”。而向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¹⁸；“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¹⁹。

11. 第 240 页，“1930 年春他（指李立三）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是 5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不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次会议上，作出 1930 年 11 月 7 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区域代表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领导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²⁰。

12. 第 291 页，注释 18，“彻除他（毛泽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观点，是 1998 年初版 278 页注释 17 中的论点之一，“彻除他（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论断的问题：一，撤销“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高华教授在书评中，提出质疑并指出，“在 1931-34 年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撤销其政治局委员一职，这并非事实”²¹。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高教授书评的质疑，删去“撤销政治局委员”，保留“彻除他（毛泽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二，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²²，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从 1931 年 11 月 27 日，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到 1934 年 2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76 页。

19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82 页；曹润芳、潘贤英：《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109 页。

20 唐志红、谭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年，第 236 页。

21 《高书评》，第 117 页。

22 王平：《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36 页。

月3日，苏二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²³。

13. 第304页，注释3中，存在的问题：一，著作中要引用的内容，在王健英的著作并没有呈现出来；二，引用王健英著作注释后面的内容，史料来源何处？三，红八军团长是周昆²⁴，“无论如何，军团长周子昆为此遭受军法审判，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由毛泽东下令除绑释放”，此处表述，按照上下行文逻辑看，周子昆，应该是因红八军团的问题，受到审判，可是问题是周子昆是因三十四师的问题，“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子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数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打散拖垮了”²⁵；“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李德要周子昆率教导团（由红二十二师缩编而成）正面强攻黄平。……专断骄横的李德指责周子昆抗拒军令，有意把部队搞跨，叫警卫队把他绑起来，送军法处审判”²⁶。红八军团是存在时间最短的红军部队，也牺牲最惨烈的部队之一，从组建时10922人，经过湘江战役，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²⁷。显然，陈著中，结果是周子昆，起因却是周昆的原因，应该是把周昆的因与周子昆的果搞错了。

14. 在311页，“他（王明）在苏共中央的指导下，于1935年8月1日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在巴黎《救国报》上，高华教授在书评，已经指出此问题²⁸。8月1日发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²⁹，不知道为何2001年修订版中，不进行修改。

23 唐志宏、谭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第248-249、256页。

24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336页。

25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78页；《解放军烈士》编委会：《解放军烈士传》（七），北京：长征出版社，1993年，第417-418页。

26 《解放军烈士》编委会：《解放军烈士传》（七），第417-418页。

27 颜梅生：《红八军团：存在时间最短的红军部队》，《湘潮》，2011年第4期，第36-37页。

28 《高书评》，第117页。

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7页。

15. 第 325 页，图片文字介绍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在八年中由 5 万扩大到至少 50 万人”，而在 331 页中，“当时中共的军队总数不过四万稍多”，两处的数据相差近 1 万人。在 326 页，“把大江南北的共军残余约 6000 人集合起来，另外成立新编第四军”；在 341 页，又说，“此时（1940 年底），八路军已从 4 万余人扩大到 50 万”。问题是，这些数据的史料来源何处？只要数据有史料来源，哪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可以争论。1938 年 4 月，新四军全军已集中 10329 人，枪 6200 支³⁰；1937 年，八路军成立时，已有 80000 人，同时，325 页图片文字中还有两处表述不准确：一，“中共将其军队编组为”；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当时，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不能说成“中共将其军队编组为”，而且八路军的序列前后有变化，1937 年 8 月年为总指挥部，1937 年 11 月称为十八集团军，最高领导层前后称为总指挥和总司令³¹，人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不能搞混乱，叙述要符合历史当时的情景。

16. 第 357 页注释 10，参考文献引用刘昶教授的文章，陈著中，又添加发挥，比刘原文中，多“极少数的富裕农民”一段词语，“极少数的富裕农民”，不还是富农吗？与前面的“富农”是相同的意思，多此一举。最致命的是刘文的引文，已经对原著进行再加工，导致出现错误，陈著没有核对原文，使错误传递到陈著。刘原文应该引用的是“按照这个合理负担办法，负担户数占全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³²，到刘文中却成为“根据当时的统计，在实现统一累进税以前，根据地的税收主要落在占全部人口 30-40% 的富裕人口头上，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和富农”³³，由原著中的“全部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变成刘文中的“全部人口的百分之

30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9 页。

3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3-8 页；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页。

32 财政科学研究所：《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239 页。

33 刘昶：《华北村庄与国家 1900-1949》，《二十一世纪》，1994 年 12 月号，第 49-62 页。

30-40%”。 “全部户数”与“全部人口”不是一个概念，当然，刘教授引用错误在前，陈著没有核对原始资料出处和具体内容，盲目引用，导致误引，引文要忠于原著，要核对无误，且不能偷换概念。

17. 第 472 页，“结果这一场被刘少奇目为经济上‘淮海战役’的改造资本家运动，又以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和平取得胜利”。这里“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社会主义改造是从 1953 年开始到 1956 年底基本完成³⁴；也与 623 页的叙述“1956 年全国私营，而到次年私营工厂则简直可以说是从中国绝迹了”不一致。

18. 第 484 页，正文和图片介绍文中，“当他（毛泽东）说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时，许多在天安门前的群众都激动地热泪盈眶”。现在的历史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此句话，不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仪式上的讲话，而是在新政协会议上的讲话³⁵。

19. 第 486 页，“在 1952 年发起三反运动”，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三反运动”，开始于 1951 年³⁶，也与 513 页图片上的叙述“1951 年 12 月中共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相矛盾。在陈著中，经常出现前后论述相矛盾的现象。

20. 第 491 页，“全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此处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政协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开国之初，暂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³⁷；492 页，图表中“政”下面，怎么会包括军事机构呢？

21. 第 501 页、891 页，“1952 年 8 月，毛泽东调邓小平到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第 502 页，“五个月后，他（指毛泽东）乘正式成立国务院的机会”；第 564 页，注释 22，“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富春”。此四处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不是“国务院”，而是“政务院”，1954 年第一届

3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77-287 页。

35 秦九凤：《知情人话误传：印证毛泽东在开国大典说的一句话》，《党史纵横》，1994 年第 5 期，第 6 页。

3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53 页。

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72 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改为“国务院”³⁸，同时，称为中共国务院也不符合中共历史的表述常识。

22. 第 509 页，“在城市或农村的社会基层，中共虽然暂时保留国民政府的保甲或其他类似制度”；510-511 页，“（1950 年代）当时最流行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两处的错误³⁹，不知道为什么，陈著在 2001 年修改版，还会出现此种现象，而且还不止一处。为回应高教授的书评中对保留“保甲制度”的批评，陈著在修改本中，增加一处引文，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可是，在引文的原著中 114 页，明确表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基层政权”，119 页，仅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长进行工作”，不等于保留保甲制度，仅是使用“保甲长”的工作关系⁴⁰；致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于 1963 年是历史事实，陈著之所以在高教授指出错误后继续引用，原因与该剧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相关⁴¹，而且《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话剧性质的文学作品，带有虚构的文学色彩，在历史学著作中，仅能够提供一个参考价值，不能当作历史史料使用，是陈著处理不当造成的结果。

23. 第 551 页，“1950 年 6 月，北韩大军南下，韩战爆发。中共虽然事先得到金日成的通知，但并未积极参与筹划，更不知道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时间表”。此处说“事先得到金日成的通知”，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事实是“已公布的史料表明：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共中央事先没有得到通报。尽管 5 月金日成来北京秘密访问时打了招呼但他并没有透露统一行动的具体时间。中国在平壤尚无外交人员对苏、朝方面的行动并不了解”⁴²。

24. 第 609 页，图片中的介绍文字中，“1954 年中共中央号召

38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第 10 页。

39 《高书评》，第 121 页、117 页。

40 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114、119 页。

41 白文：《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戏剧报》，1963 年 01 月 31 日；袁成亮：《〈霓虹灯下的哨兵〉诞生记》，《党史文汇》，2005 年第 11 期，第 44-47 页。

42 刘统：《中共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的预测与对策》，《党的文献》，2001 年第 6 期，第 52-57 页。

成立农业生产合作”。此论断，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抗战时期，山西革命老区农民就自发地成立一些劳动互助组”⁴³；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已经规定实行农业合作社政策⁴⁴；1953年9月，正式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⁴⁵。

25. 第617页，“1952年中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在农村经商致富的机会几乎断绝”。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是1953年，这里的1952年，明显不对，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⁴⁶。

26. 第639页，“荣毅仁此时（五反运动时）是中共的国家副主席，因为毛泽东说了几句好话，所以其承认的赃款尽管是天文数字，也立即摇身一变，由基本守法户变成完全守法户”。此处的论断，有两处，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是历史事实错误，荣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是“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⁴⁷，而且，表述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也不恰当。当时，对资产阶级的处理分为五类，“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荣毅仁最终被定为“守法户”，而且陈著引文也有原著文章不尽一样的地方，在薄文中是“资本家接连跳楼自杀的现象，情况十分严重”⁴⁸，陈著中成为“资本家跳楼自杀的很多”，引文要忠于原文。

27. 第692页，“反右运动进行期中，仍然按原订计划进行党内整风”。此论断，在1998年初版中，高华教授曾提过质疑，并

43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71-74页。

44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档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页。

45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

46 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的回顾》，《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54页。

47 《荣毅仁：从“红色资本家”到国家副主席》，《检察日报》，2005年10月31日（8版）；计泓庚：《荣毅仁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48 薄一波：《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3-11页。

举例证实自己的观点⁴⁹，高教授的质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历次整风运动，首推延安整风，陈研究员应该很清楚，写过专著《延安的阴影》。1957年的整风运动，“风”未整过多少，倒是整了不少人。但是，不能理解的是陈著在2001年修订版中，对此观点仍然保留，只是增加一个注释⁵⁰，即高华教授书评中举例的书籍⁵⁰，解释的语言也基本是高华的语言体现。问题是，高教授就是利用戴的例子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或陈著中观点的不正确，但是，陈著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却引用戴著作反面的论证，而且不像690页注释⁵¹，提到杨奎松教授的名字，此处连高华教授的名字也未提，此处应该是高教授的学术贡献。目的是稀释自己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陈著中的此论断是仍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不听从高华教授的良言而为，进行修订。

28. 第701页，“（莫斯科会议后）1958年年初，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此论断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关于毛泽东第二次莫斯科之行的时间，在1998年初版中469页，说是1958年，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错误⁵¹，在2001年修订版中，陈著已经进行修改，但是，陈著篇幅过大，顾前不顾后，2001年修订版本，虽然把莫斯科会议去时的时间修改，但是，在701页，把回来的时间又搞错。毛泽东以及中共代表团是1957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⁵²。

29. 第708页，“八大二中会议轻易地通过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707页最后一段的内容来看是介绍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情况，叙述到708页却变成“八大二中会议”。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在中共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只有中共八大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八大第二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而八大二中（一般称为“八届二中全会”，陈著中称为“八大二中会议”）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八大第二次会议不等于八大二中全会

49 《高书评》，第120页。

50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1 《高书评》，第117页。

52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二），《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1期，第19-46页。

议，她们之间的差别大⁵³，也是中共党史上两次最易被人们混淆的党的会议⁵⁴，结果陈著中真搞混淆。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会议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而不是陈著中的八大二中会议⁵⁵。同时，该论断还有个表述不当之处是“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难道还有“旧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3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⁵⁶。

30. 第 877 页，图片介绍中，“1991 年 5 月，江青据传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另说在女儿家结束生命”。此论断，有两处不妥：一，“据传”，历史著作用语要严谨，不能用道听途说式的语言；二，“另说”的史料来源何处？在 1998 年初版 846 页中，陈著是这样叙述的“1991 年 5 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杨奎松对此论断，提出质疑，认为是“在女儿家（自杀伤亡）”⁵⁷，陈著 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杨的质疑，改为现在的表述，结果是弄巧成拙。江青的自杀地方，用当时政府的通告，最权威，“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⁵⁸。这样的表述，不仅解决质疑问题，还符合历史的叙述，在监狱或者在女儿家都属于居住地。

31. 第 913-914 页，“1987 年 9 月，海南岛建省，这时全部一个省都可以变成经济特区”；图片文字介绍中，“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此两处的论断，明显是错误的：“1988 年 4 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投入兴建”⁵⁹。

32. 第 920 页，“1980 年底，中共闻放省人民代表的选举”，

53 吴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等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历史学习》，2002 年第 4 期，第 16-17 页。

54 李美玲：《关于“八大二次会议”与“八届二中全会”——从一条注释的错误说起》，《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7 期，第 126-127 页。

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313 页；马齐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第 146 页。

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260 页。

57 《杨书评》，第 177 页。

58 （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62 页。

5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444、437 页。

此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1979年下半年开始，经过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的两次试点，1980年下半年，中共开放的是县级人代会代表的选举，而不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⁶⁰。

（四）论点或观点问题

“论点或观点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只要观点中立，不偏不倚，不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保持某种独立的价值观，“History”中的“His”是男性“他（的）”，第三人称，即从第三方看历史的意思。如高教授所说，“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起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被视为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⁶¹。陈著有许多论点或观点，就属于此种情况，杨奎松教授也提出过质疑，“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⁶²，不是一部严肃史学著作应有的面貌。

1. 第4页，“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无论此观点对与否，或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论，但是，不符合中共党史的叙述模式，应该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⁶³。

2. 第9页，“则中共的确已告别‘革命’”。注释1，仅提供一份史料证据，就能证明中共的确已告别“革命”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表面看是结束，但是，“革命”的思维和方式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看仅一所南京大学，从1978年以来发生的事件⁶⁴，可略见概貌，同时，还要知道李的告别“革命”论，受

60 阿计：《历史的选择：人大50年》（续篇一），《政府法制》，2004年第9期（上），第14-21转31页；白益华：《全国第一届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始末》（上下），《中国人大》，2004年11月25日、12月10日，第40-43页、50-53页。

61 《高书评》，第119页。

62 《杨书评》，第186页。

63 李曙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怎样提出和确定的》，《青大师大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1-8页。

64 “从1978年到1991年，仅在南京大学就发生过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当局的严厉查处和批评，但结果却是令官方难堪的”。熊思明、徐晓：《史家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此书出版于2012年，超出本书评的论证时间范围，但是，“五次重大思想事

到多么强烈的反击⁶⁵，一直到现在，“无法告别革命”⁶⁶。

3. 第10页，“他们有时反而比毛泽东更‘左’，而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德怀是等而上之者，他们尚且不免有这种问题，等而下之者就不堪闻问了”。此观点的问题：一，史料来源即证据是什么？二，高教授书评中，也提出过质疑⁶⁷。不知道，陈著为什么还坚持此观点？坚持此观点，也没有错误，因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可有自己的论点或观点，问题是仍然缺乏史料的支撑，最关键也是与陈著中后面的相关论述也不一致。特别是说“彭德怀等而上之”，更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合，陈著中此观点涉彭，应该是指彭德怀与袁文才、王佐案和1958年军中“教条主义”案。在256页图片介绍文字中，陈著也谈到“当是，彭德怀奉令率军执行”；在271页，“命令军长彭德怀率部诱杀王、袁两人”，学术界关于此事，已经非常清楚⁶⁸；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有关，彭德怀是负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也不致于负“等而上之”之责⁶⁹。

4. 在陈著中，俄国、苏俄与苏联的概念混用现象严重。仅举：第67页，“苏俄”和“俄国”同时使用；75页，“留俄”；137页，苏联；141页，苏联和俄国同时使用等。75页的“留俄”，肯定是错误的，应该是“留苏”；137页，应该是苏俄；141页，应该是苏俄。同时，144页，苏共和俄共一起使用，后者应该也是苏共。历史研究的概念要界定清楚，要在不同的时段，使用不同对应的国名或组织名称，特别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时，正如云庵说，“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全称是‘俄罗斯苏维

件”，在当时基本都有文章发表，如，蒋广学：《一篇理论文章的命运及其思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的是非曲直》，《学术界》，2003年第4期，第205-215页）。

65 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42-46页；谷方：《评告别革命》，《求是》，1996年第15期，第14-20页，等。

66 刘巍：《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瞭望》，2011年第20期，第40-42页。

67 《高书评》，第120页。

68 “关于袁文才和王佐案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陈培均、吴直雄：《略谈袁文才、王佐之死》，《南昌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23-26转37页。

69 萧克、李锐、龚育之：《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第179-191页。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始称苏联。本研究（何著）跨越1922年，故称苏俄。其共产党组织名称同样几经变化，有俄共（布）、联共（布）、苏共几个时期，本研究在涉及不同时段时，即用当时对应的名称”⁷⁰。这才是历史研究的规范之方法。

5. 第216页，“革命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若非东风压倒西风，便系西风压倒东风”。此处引用毛泽东的“东风与西风论”，明显不合适，属于“往前移置”名词。“东风与西风论”，虽然，原出自于古典名著《红楼梦》，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明显源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⁷¹。高华教授，在一篇书评中也谈到此种现象，举例说，“‘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⁷²。同样，将“东风与西风论”迁移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不恰当的”。

6. 第244页，“派亲信前往中共中央（包括赣南和闽西）、鄂豫皖和湘鄂西三大根据地”。这里的“中共中央”是什么意思？怎么还包括赣南和闽西，从括号中的内容看，应该是一个是地理方位的名称，从后面的内容看，三者应该是并列的关系，“中共中央”应该改为“中央苏区”⁷³。

7. 第460页，注释44，陈著的引文是“学生在原来的‘反饥饿’和‘反内战’口号下，遂又加上‘反迫害’三个字，继续激荡人，扩大民众离心离德的效应”。可是在引用的原著页码中，根本没有“反迫害”三个字。同时，陈著中，也没有把原著的书名表述完整，少时间的界定（1945-1949）⁷⁴。

8. 第474页，“白白死了二千万到四千万老弱妇孺”。此论断

70 何云庵：《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页。

71 青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东风压倒西风》，《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9-47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莫斯科会议（二）》，第19-46页。

72 高华：《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评〈博古和毛泽东〉》（上），《二十一世纪》，2009年12月号，第120-128页。

7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107页。

74 施慧群：《中国学生运动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存在的问题：一，数据史料来源问题，数据跨距 2000 万之多，杨继绳先生还认为“符合事实”⁷⁵；二，“老弱妇孺”是指年老体弱的妇女和年幼的儿童⁷⁶，不仅仅包括老体弱妇女和儿童，还有成年男女各类人群⁷⁷。

9. 第 476 页，第一段用三个“起码”词语，特别是“更不能后退的社会主义起码体制”。真不能理解此处的“起码体制”是什么体制？

10. 第 479 页，“毛泽东的失败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更可能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因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⁷⁸，“更可能”，虽不确切，但是，不能归因于一代知识分子，毛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如黄万里、顾准、束星北等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11. 第 491 页，“周恩来名义上是政务院总理，但在党内却只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书记而已”。此语段有两处不当，一，“名义上是政务院总理”是什么意思？二，“党内却只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书记而已”。周在党内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党的领导，政务院成立党组（党组干事会）⁷⁹。周恩来，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又是政务院党组书记的双重身份。这是中共的政治运作方式之一，到现在仍是如此，总理是国务院党组书记，同时，在党内的最高职务是政治局常委。第 492 页，图中的“政”系统中，怎么包括军事方面呢？区分不清晰。

12. 第 500 页，“进入北京之后，中共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中共中央政府”。这里的“中共中央政府”，明显表述不恰当，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⁸⁰。

13. 第 562 页，“签订和平协定”。此表述与历史事实不一

75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第 784、408 页。

77 “杨继绳先生也看到此问题”。《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8 “杨继绳先生也认为说得对，其实倒是杨先生的补充说明，抓住问题的本质”。《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9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195、242 页。

80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 6 页。

致，应该是“停战协定”⁸¹。也与563页的图片中“停战协定”的表述不一样，前后矛盾。

14. 第658页，“（建政后）任命其中享有清望者为国家副主席或正副部长”，“给予他们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代表的礼遇”。此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国家主席”，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后，才有的政治概念，1949年，政协会议上，选举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⁸²；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称谓前后有变化，1949年政协会议时称为代表⁸³，新时期则称为委员⁸⁴，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是“代表”。

15. 第685页，“（罗隆基）竟然发言说道：所谓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此论断，不是罗隆基的原话，其原话是“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⁸⁵。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歧视。

16. 第688页，“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中，有十几万是小学教员，然而从所占人口比例来说，受打击最多最重的，仍然是高级知识分子”。此论断肯定不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而且参考文献原文中，也没有“受打击最多最重的，仍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论断⁸⁶。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中，为什么出现许多如此的现象，不尊重原文的意思。不知道陈著中的结论何来？“右派分子”中最多，而且受到打击最重的是基层右派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江苏省是如此⁸⁷，全国更是如此“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⁸⁸，当然，受害最深的也是基层右派分子，看看杨显惠的夹边沟纪实系列

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243页。

82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7页。

83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84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115-116页。

85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287页。

86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308-309页。

87 谷彦梅、董国强：《一九五七年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小学反右派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第89-95页。

88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第48-70页。

著作⁸⁹，看看基层右派分子的回忆录或文章⁹⁰，会明白许多。

17. 第 689 页，“右派人物分成极右、中右和微右三种，其实这 55 万人可能只是‘极右’右派分子”。此论断，至少有三处不当之处：一，右派人物的分类，分为“极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等⁹¹，未在其他著作中见过“微右”的称谓，即使有，陈著应该给予参考文献注释。因为，后来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分子，工人、农民中的“右派分子”，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起名曰：“反社会主义分子”⁹²。二，55 万右派分子，是一般党史专著对全国在反右派运动时，划右派分子的总数的估计，不能都是“极右派分子”，“极右派分子”是反右派运动时，划分的右派分子中处理最严重的分子，“极右派分子”是一部分⁹³。三，又出现“可能”一词，不严谨。

18. 第 741 页，注释 54 中，陈著说“关于大饥荒，有两本知识分子的日记值得阅读。这就张贤亮，《我的菩提树》和顾准，《顾准日记》的《商城日记》部分”。此论断中，把《我的菩提树》当作日记的一种，不确切，张著是一种小说体，出版的封面上，就标注为“当代小说文库”⁹⁴，文学界也是把它当作一种特别小说来看待的⁹⁵。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同时，陈著还认为，“（饥荒史）宏观研究必须有微观研究配合，可惜这方面的书籍不多”。此论断与学界的研究现状不符合，其实对于“饥荒史”的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已经取得

89 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

90 许春耘：《我所经历的反“右派”斗争》，《江淮文史》，2006 年第 7 期，第 86-97 页。

91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第 48-70 页；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41 页；曹树基、李楠：《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学术界》，2010 年第 1 期，第 180-194 页。

9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12），第 231 页。

9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310 页。

94 张贤亮：《我的菩提树》（封面），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年。

95 谢勉，等：《〈我的菩提树〉读法几种》，《小说评论》，1996 年第 6 期，第 32-37 页。

重大学术成果⁹⁶。

19. 第 838 页，“摔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其中的“摔石头”，应为“甩石头”，陈著给的参考文献 407 页，清清楚楚⁹⁷，党史的习惯用语或专有名词，不能乱用。

20. 第 860 页，“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影响，还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上”。此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固然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影响，无论从宏观⁹⁸还是从微观的角度⁹⁹，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最大影响”，肯定不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否则，陈著中参考的文献《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根本没有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文章¹⁰⁰，“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影响是打倒一切，各种武斗，对普通生命的残害¹⁰¹，没有看到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危害。

21. 第 861 页，引用的图片。一，没有注明来源；二，照片是 1964 年，毛泽东接见钱学森和陈永贵，时间与叙述的背景文革时期不一致。

22. 第 875 页，“难怪市井中开始传言他（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私生子了”。历史著作是严肃的作品，不能有半点的虚假，此论

96 丁抒、冯容、杨继绳、曹树基、陈意新，等都作出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作者还写过关于饥荒史的书评，《〈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by Jasper Becker；〈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丁抒著；〈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李锐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 年第 27 期。

9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07 页。

98 陈清：《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4 年第 6 期，第 34-38 转 59 页、宋连生：《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痛教训》，《炎黄春秋》，1998 年第 11 期，第 14-20 页、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99 梁志远：《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炎黄春秋》，2006 年第 4 期，第 24-29 页。

100 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

101 郭文亮：《大动乱年代的艰苦抗争》，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1994 年，第 27-33 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97-606、651 页。

断，没有史料来源，就是信口开河，而且还是市井传言。

23. 第 877 页，“他（华国锋）所说的现代化，实际上便是周恩来 1975 年所提过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四个现代化”。此论断中的时间“1975 年”是不对的。周恩来早在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化”目标设想¹⁰²。

24. 第 880 页，“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政治吞噬其他人生层面的时代”，其中“其他”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不理解。

25. 第 903 页，“此后，便不再有不可平反的政治案子了”。此观点，明显是武断，而且是错误的，直到现在还有未解决的政治案子，特别是反右派运动时的案子，为证明其是准确性，只是犯扩大化的错误，还有中央级的五位右派分子至今“不予改正”¹⁰³。

26. 第 936 页，“任何一对夫妻，只要生产超过一胎，干部便要强迫堕胎”。此论断，肯定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政策不同，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82 年，还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生育”的政策¹⁰⁴，而且根据笔者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观察，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一对夫妇第一胎生男孩，则要采取生育措施；若第一胎生女孩，则可以生第二胎，第二胎要是继续是女孩，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为要“男孩”来传宗接代，则要想方设法超生，逃避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处东躲西藏，才有“超生游击队”的说法，但是，一旦被抓住，则要采取手术引产等措施。因此还造成大量的，包括干群矛盾严重对立等社会矛盾¹⁰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39、479 页；薛培松：《四个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31-35 页。

103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第 4-5 页；王海波：《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世纪》，1995 年第 9 期，第 14-17 页。

104 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年，第 126 页。

105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27. 第 956 页，“县、区、乡、村等行政单位”。此论断中，把“村”当作行政单位是错误的，“村”是群众自治单位¹⁰⁶。

28. 第 1042 页，“（毛泽东）不仅以中共党主席的身分出任新政权最高民意、最高行政和最高军事机构的主席”。此论断中，“最高民意、最高行政的主席”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最高民意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委会；“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即政务院或国务院，1949 年政协会议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国家最高政权机构¹⁰⁷。毛泽东从未出任此过最高民意机构的领导人。

（五）问而不答：陈著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影响阅读的问题

陈著一个重大的优点是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判断一篇文章或论著的学术水平，关键就看其提问的能力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从此角度看，显示出陈著的高水平，但是，陈著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杨奎松教授指出，“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但是提出的问题太多，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困”¹⁰⁸；齐锡生博士也感觉到，“对于某些重要问题，本书似乎还可以用更多篇幅加以阐述，让读者对如此重大事件当代‘革命性’能够获得更彻底的了解”¹⁰⁹。杨教授和齐博士都为陈著对提出的问题处理不够即“提出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感到惋惜，外审专家给本文作者的意见中也认为此问题是“最影响阅读体验的问题”¹¹⁰。这也是让本为同行的杨教授（研究中共党史的顶尖级专家之一），“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似乎不是很成功”¹¹¹。遑论一般读者，而且陈著目的是“写一本一般读者都可以读、也都喜欢读的书”，结果是适得其反，“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会感到不知所从”¹¹²，这是陈研究员以及陈著所

106 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129-140 页。

107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 6 页。

108 《杨书评》，第 188 页。

109 《齐书评》，第 212-213 页。

110 《外审专家给予作者的意见》，2024 年 03 月 09 日。

111 《杨书评》，第 188 页。

112 《杨书评》，第 189 页。

始料不及的。

确实如杨教授和齐博士所言，陈著的问题意识，特别强烈，大问题带着中问题，中问题包含小问题，问题套问题，类似俄罗斯套娃式的问题意识，连环问。在 2001 年修订版，此最大的问题依然存在。

1. 第 44-45 页，在导论中，陈著问“三个大问题”，也是陈著着力要解释的核心问题，在 2001 年修订版中比 1998 年初版，又增加许多小问题。对“三大问题”，杨教授质疑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关系”，认为陈研究员的解释“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从而影响涉及问题的判断¹¹³。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对质疑的 1998 年初版 736 页、738 页与 970 页的论断，主要观点依然保持初版的内容。只是进行史实问题修订，而且有些还修改错误（初版 970 页）“轶出苏联模式”到（修订版 1008 页）“放弃苏联模式”。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走向最终的破裂，陈著的解释是一种表面化的现象，没有抓住本质的原因。历史多面相中，杨教授的提示，看到中苏关系破裂的真谛¹¹⁴。

2. 第 130 页，陈研究员又提出两个有价值的问题：“首先，中共内部除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外，很少有当时被认为大知识分子级的人物，初高中和师范生远多于大学生，党员以小知识分子为主；其次，中共党员中的日本留学和勤工俭学的学生远多于一般欧美留学生。这两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这两问题，对中共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问题，也得到共产革命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证实¹¹⁵。可惜，陈著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接着在 133 页，陈著一口气又提出五个问题；到 145 页，陈著又连珠炮式发问，其实这三个问题与 130 页的问题，意思较一致，可惜也没有得到解释；到 150 页，陈著回答一个问题，仅靠陶希圣的回忆录中，关于学历、办公桌的待遇不同¹¹⁶而确定“早期中共党员中，为什么留日学

113 《杨书评》，第 191 页。

114 《杨书评》，第 193 页。

115 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06 年 8 月号，第 38-51 页，等。

11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 73 页（此版时间超出 2011 年的时间限制，未看到陈著引用的版本，但是，内容一样，故引用）。

生比留欧美的学生为多”之问，显然过于简单又草率，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同时，陈著要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都是中共共产革命伊始，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杨奎松教授所说，有两个问题，陈研究员的以前两本著作已经作良好的解释¹¹⁷。但是，不可否认，“三大核心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其实陈研究员，所处的学术环境更有利于中国共产革命问题的阐释，原因在陈研究员与大陆学者交流时，已经表达出来：“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的装饰、掩盖和曲解”¹¹⁸。看来，陈著存在的问题解释上仍然有很多需要回答。

以上，提出五类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因学识和能力，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期待学术界讨论，进一步推动研究中共党史，探讨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四、结语

陈永发研究员所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力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高华教授、杨奎松教授与齐锡生博士先后发表书评，并指出该著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1998年初版，进行修订，2001年出版修订版，2011年12月已八刷，足见，陈著的影响之大，受欢迎之程度。同时，陈著也是一部辉煌巨著，分为上下两册，1146页，时间跨度书目看是七十年，实际上是超过七十年，而且“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是一件学术盛事，惠及学界。但是，个人写中共通史，“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¹¹⁹。

但是，2001年的修订版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史实”错误的“硬伤”。本文在学术界对1998年初版书评的基础上，参考一系列学术成果，对2001年修订版作书评，提出五类问题，

117 《杨书评》，第191页。

118 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掠影》，第90-91页。

119 《杨书评》，第174页。

包括“语言或表述问题”、“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史实问题”、“论点或观点问题”与“问而不答”等，说明陈著是有问题的经典之作。本书评与陈研究员再商榷，期待着陈研究员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回答读者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革命研究中尚未解答的深层次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不能否认陈著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经典之作。正如齐博士所言，书评“无非是书评人努力挑剔的结果，不论正确与否，它们都无法掩盖本书其他方面大量的优点”¹²⁰，此观点仍然适用于2001年修订版。相信这些也是陈研究员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¹²¹，也更能促进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120 《齐书评》，第213页。

121 《杨书评》，第194页。